

论中国古代隐士

——以陶渊明为例

张梦秋 西安工程大学

摘要: 中国古代多隐士, 隐士多文人。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 隐士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特色之一。“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当为世之隐匿之高人也。《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 借风云以为气”, 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中国隐士文化是颇为发达的, 是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 隐士文化使中国历史更具韵味。隐士文化中特有的生活与审美理念, 对于士人和社会, 对于文学与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和文人画中所反映的大多是隐士的眼光与情怀。三千年, 隐士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着, 既有大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与隐逸者个人的思想心理有关, 也与儒道互补的文化气氛相联系, 其独立人格和自我尊严是隐士人格中最富光彩的部分。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 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或厌倦官场时, 往往回归到陶渊明, 寻找新的人生价值, 并借以安慰自己。隐士具有时代性, 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 但总的来说, 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隐士的存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士大夫的人格心理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也不否认中国隐士命运多舛且自身存在着消极避世的思想及行为。

关键词: 隐士思想; 隐士特点; 陶渊明; 士大夫; 自我独立人格

隐士思想, 历来占据传统文化精神最崇高、最重要的地位, 只是它如隐士的形态一样, 一向采取“遁世不见知而无闷”的隐逸方式。如果强调一点来说, 隐士思想与历史上的隐士们, 实际上, 便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要角色。至于讲到道家的学术思想, 更与隐士思想, 不可分离。与其说道家渊源于黄、老, 或老、庄, 毋宁说道家渊源于隐士思想, 演变为老、庄, 或黄、老, 更为恰当。在现代的学者中, 人们非常强调道家思想与隐者的关系, 隐者被认为是道家的社会基础。隐士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方面, 它是知识分子独有的一种思想, 在内心抑郁得不到抒发时, 就选择遁迹山林, 寄情山水。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 隐士思想的确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法和处世哲学。

隐士表面上超脱, 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 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他们洁身自好, 不求闻达, 只追求自身的修养境界, 思想上都接近道家的清静无为观点。魏晋文人放任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玄尚远的清淡风气的形成, 既和当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 也和当时战乱频繁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清淡又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淡并不是漫无目标, 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比如“才性之辩”, 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如, 由于道家思想流行, 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 此外, 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 也受到人们的重视, 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 也成了

清淡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 精通“三玄”, 不仅在清淡中才思敏捷, 侃侃而谈, 而且著述有成, 成了一代玄学家, 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 魏晋之际的向秀, 西晋时期的郭象等。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 就是一例。“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 当起隐士, 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 邦无道则隐”; 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文人得意时仕, 失意时隐, 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 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 就是出现了对于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 超然辞世伪, 得意在丘中, 安事愚与智。”

隐士的类型, 根据士人隐逸的动机与目的, 性格与情趣及隐居的方式不同, 中国古代的隐逸者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第一种是淡泊型, 这类隐士生活淡泊, 甚或性格乖张, 不慕功名利禄, 无意升官发财; 遁迹山林, 逍遥于青山绿水之间; 安若节, 甘贫贱。如南朝褚伯玉, 少有隐操, “寡嗜欲, 居瀑布山三十余年, 隔绝人物, 唯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数十载, 终于老死山林。这类隐士不急于政治原因, 纯属个人的洁身自好, 有意逃避喧嚣的尘世, 他们以名利为轻, 心如止水, 身似枯木, 又襟怀高旷, 笑傲万物。第二种是抗议型隐士, 一部分是由仕宦而归隐, 如

陶渊明。陶渊明一生于士大夫最看重的隐士出处上毫不苟且，在这方面的人生选择，尤其表现出一种特立独行、不同流俗的人格精神。随入世以来对黑暗现实的深入了解，陶渊明已经看透了东晋政权的腐朽及其灭亡之运的不可逆转。在古代社会，用仕行道，是孔子以来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最佳选择，而所谓“仕”，以孔子的初衷，仅为行“道”之手段而已。若世事污浊，道不可行，则退求其次，不仕而“独善其身”。所谓“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正是怀道避世，不与黑暗现实妥协之意。而陶渊明在仕隐的选择上，则完全坚持了理想主义的态度，他谨守先师遗训，以时进退，不与现实同流合污。在《饮酒》第九章中，陶渊明尝借与“田父”的对答之语，委婉而坚决地表述了他之所以归隐的用心：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褰襟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举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已诤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赵山泉曰：“时辈多勉靖节以出仕，故作是篇。”从诗中不难看出，诗人拒绝出仕而以栖隐来坚持某种人生理想的态度，正与屈子去国的精神一脉相通，它证明了陶渊明完全不是那种为隐而隐的隐士。陶渊明虽然于世事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但比起孔融、嵇康、阮籍等人，他的态度要自然得多，不至于招致统治者的注意。陶渊明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陶渊明武陵桃园理想所开启的是一种文化，作为东方乌托邦的象征符号之一，桃花源表现的是人类对最贴近本真的古老的生活方式的回忆，它促使人们在浸染现实红尘的心灵中始终保持着一块净地。同时，它又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物质文明日益发达而精神世界却日益式微的情形下时时提高警惕，努力还原人类最本真、美好的东西，不至于被现实中的、非本身的东西所异化。在这一点上，桃花源的意义是永恒的，它所启迪的文化价值也是永恒的。超脱、旷达只是陶渊明生命的物质外壳，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才是他对自我生命最深切的体验。他悲慨于个体生命在永恒时间之流中的段子，“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他悲叹个体生命价值在历史长河中的卑微，“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空”。陶渊明的孤独是生命的孤独，是人生的孤独。他的哲思是他对自己生活、感情的感受和体会，他诗歌中的孤独体验是复杂和深重的。另一部分是与当权者政见不合而不肯出仕，如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他借饮酒狂醉，给世人以“无材”的感觉，因为不被“砍伐”，结果享尽天年。这是政

治高压下被扭曲了灵魂的佯装，是痛苦的被逼无奈的选择。由于阮籍具有很高的哲学修养，更自觉和独立的人格精神以及情感中“永恒感”与“变化感”的超然一体，其思想和作品具有“遥深”的特色。《咏怀》诗表现出他的思想是以曹魏朝廷中的四次巨变为标志而逐步发展，经三个发展阶段而达到内心的某种自觉超越。另外，也有基于民族矛盾，不肯为异族所用者，如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这种隐士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而又斗争无力，由仕官转身而隐逸，这类人往往廉洁自律，品性高洁，关爱民生，痛恨暴政，有民族气节，正气凛然。如有机遇，还会由隐而显，奋发有为。第三种是老庄型隐士，这些人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不求闻达，超然物外，遁名避世。他们崇尚自然，追求朴素，向往无为，追求人性的天真纯朴，自然浑成，反对外在诱惑和压抑。第四种是清高型隐士，他们主要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思想从本质上讲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生活态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厚实的志士仁人。但儒家又非盲目入世，而是看其主张的“道”是否可行。孔子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关键看其政治理想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类隐士有待时而起，待机而发的情形。但又孤傲不屈，卓然独行，蔑视当权者，清高是其特点。这类隐士不一定非要隐迹山林。其隐多表现为不参与政治，修身养性，或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多在学术思想方面有建树。

“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它指的是阶层，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旧时士大夫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说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即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士大夫精神的根本所在。他们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为他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这便是士大夫的高善的品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魏晋乱世，所以黄老之术盛行的原因在此。许多士人走向了归隐这条道路，例如陶渊明。他选择归隐的道路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魏晋风度时指出：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与血污的社会和时代中产生的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表面看来是潇洒风流，而其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时代心理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影响是尤为深刻的，人们能够较为直观地感

受到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汲汲用世的外向，归于自我的内敛心态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意识是儒道互补的矛盾构造。他们往往把注意力投向内心世界，力图以自我心理的调整去适应外境的变化，为个体生命和精神寻找依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境界，内心的和谐与平静，这是儒道互补结合的产物。

晋宋易代的社会现实需要文人们在几乎来不及思考的瞬间就要做出自己政治即人生的抉择，陶渊明是一个非常具有哲思、对人生有反省的诗人，他选择了归去田园。陶渊明之所以归隐，其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原因是陶渊明因为不愿意和那些不遵守儒家纲常的人同流而做出的一种人生选择，其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坚守。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中国古代隐士是一群对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等生命理想有着强烈渴望的人，他们有高于常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治，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现实政体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生活在高压专制统治时代，要么顺从皇权统治，要么放弃功名欲望，两难的选择使中国古代文人的性格动机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所以，他们的人格压抑感更强、心理更加悲苦。然而归隐的生活，使他们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自己。陶渊明的“归去”是从政治和世俗社会向自然和自我本性的回归，这种回归很坚决，其中伴随着诗人本身的潇洒、自适的本性。陶渊明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和人生道路的坚守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他注重表达自己对理想人格的坚守。无论是发现自然还是发现自己，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隐士们在自然和自我人格之间建立起了诸多富含艺术精神的隐喻关系。鉴于喧闹、污浊的社会现实与自己人格理想的矛盾，隐士皈依山水自然最重要的动机就在于他们发现了自然中有与他们自己的人格追求相契合的“真”、“静”、“深”、“幽”、“旷”、“远”等品性，而隐士的文化活动又进一步丰富、提升了这些精神品性，并使之在山水艺术的创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古代隐士不仅拥有富含艺术精神的人格，而且他们都是具有丰厚的文化修养、心性聪慧的人。他们多以道、禅思想为精神支柱，融合了儒家以艺术陶养性情，以“礼”、“乐”达“仁”，进而在“礼”的秩序中“游刃有余”的思想，并将之内化在自我人格的深层，在内心建构了一个力量强大的自我机制。因而，他们有足够的心理抵御物质世界的喧闹，从而将全部的生命热情投注在心灵花园的建设上，淡泊功利，从容平

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侧重表现出对人情、时事的看法与见解。在诗歌的语言风格上，既有“依依墟里烟”的静穆与飘逸，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与自在，他的诗歌多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是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加工，充满着自然宁静的味道。从中，也可以看出陶渊明的人格是多么的独立和高尚。

中国隐士文化，是古代正直文人因失意仕途或不满浊世等，而采取消极避世的一种人生态度，它是古代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高洁人格的体现。从传说中的许由，先秦时代的接舆、庄周到清代的随园主人袁枚等，隐士文化延续了几千年。中国古代隐士的传统情怀，“厌恶官场，鄙弃功名”的价值取向，“深愧平生之志”的生命悲剧意识，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天性，归隐山林的决心，都一一展现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隐士们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在返璞归真、怡然自得的生活体会到了隐士生活的情趣。历史上有名的隐士——“浔阳三隐”，指东晋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三位隐士。周续之进入庐山，跟随高僧慧远学习；刘遗民在庐山隐藏踪迹；陶渊明不接受诏命。南朝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唐宋之问《游称心寺》诗：“释事怀三隐，清襟谒四禅。”明夏完淳《避地》诗：“月下归三隐，春风动五噫。”就是指他们，因都住在庐山附近，亦称“庐山三隐”。还有秦末汉初的五大隐士，都体现了中国古代隐士的追求与理想。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我国古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心态。而在这几千年的文化中，中国古代隐士为我们所呈现的，也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不过，中国古代隐士身上也有些消极避世的思想，这是它的不好的一面，我们要正确看待，吸取其有利的一面。

参考文献：

- [1] 陈鼓应. 道家的人文精神,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2] 景蜀慧. 魏晋诗人与政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3] 高明毅. 中华名人与酒,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 [4] 叶嘉莹. 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5] 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陶渊明资料汇编,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作者简介：张梦秋(1993-), 女, 本科, 西安工程大学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 戏剧戏曲服装。